

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部分获奖成果推介(四)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评价

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也强调，要统筹管理好重大评价评选活动，建立成果评价体系，畅通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应用渠道。为切实加大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的宣传、推介和普及力度，使获奖成果影响力更大，实效性更

强，为加快推进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奋力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服务，自2017年10月11日起开辟专版，对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出的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成果进行推介。

《基于国际引文的技术知识扩散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李平 宫旭红 张庆昌



李平，山东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管理学部部长，二级教授，博导，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山东大学、上海大学、青岛大学博导等。长期致力于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是国内国际技术扩散与技术创新领域研究的最早探索者之一。先后主持纵向科研项目40余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4项(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软科学2项、教育部课题5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在三联、人民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专著30余部；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开放经济条件下，文献是后发国家增加知识存量及提升创新速率的重要渠道。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例，文献技术知识扩散在其科技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师夷长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资料及洋务运动翻译的书籍促进了中国由手工业时代向机器生产时代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俄文教科书及文献资料的翻译学习有利于中国承接苏联项目及建立自身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文献资料大量进入中国，纳米、生物制药及无线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均离不开对前沿文献的学习及追踪。就跨国技术知识扩散而言，国际引文可以直接抽象为国际技术知识流动的轨迹和书面凭证，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文献次数越多，说明其利用外部技术知识越多。本研究基于CSCD数据库的期刊引文统计得出，中国期刊论文发文量由2002年的67万篇上升到2008年的1152万篇，篇均引文量由2002年的7.5篇上升到2008年的15.3篇，其中来自OECD国家的篇均引文量由3.8篇上升到7.9篇，年均增长率高达10%。

就目前中国而言，如何利用外部技术知

识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话题之一。现有国内外就引文技术知识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学科知识扩散方面，虽然均充分肯定了科技出版物在技术扩散中的作用，但相关研究多以理论和综述性的文章居多，很少有学者就国际引文知识扩散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究其原因，数据统计的烦琐性及引文技术知识扩散的难衡量性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献承载技术知识的特点决定其作用机理的错综复杂性，较之贸易、FDI等渠道，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更强的吸收能力来消化吸收及应用引文技术知识。基于此，该成果尝试性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解答以下问题：由国际文献发生的技术知识扩散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比之其他的技术知识扩散渠道，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效应究竟如何？东道国吸收能力因素对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效应的影响如何？

该成果选取有“中国SCI”称号的CSCD数据库收录的72万条引文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结合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的特点，将其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结为知识

存量累积效应、人力资本增值效应、研发绩效提升效应和持续创新导向效应；其次，借鉴LP法构建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的衡量指标，并实证检验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第三，借助内生门限方法将中国各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等吸收能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拓展了东道国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具体研究结果显示，由国际引文带来的技术知识扩散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其人力资本增值效应、知识存量累积效应及持续创新导向效应显著为正，而研发绩效提升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示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等吸收能力因素对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整体上，各吸收能力跨过一定的门槛值后，国际引文技术知识扩散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显著提高。这启示我们，中国在借助国际引文获取外部技术知识扩散的同时，应加大自身的吸收能力建设，以快速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并实现技术赶超。

技术创新是一国竞争优势的源泉。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文献在发展

中国家获取技术知识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技术知识扩散的重要渠道，文献承载的技术知识具有显性、公开可获得性、可重复性、可保存性、累积性、多层次性和多主体应用性等特征，较之国际技术扩散的其他渠道，国际引文技术知识获取成本和难度较低，科技工作者可以方便地借助前沿文献提升自身的知识存量及技术创新能力。就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言，如何借助文献获取技术知识以尽快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中国在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应加强吸收能力建设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引文获取外部技术知识，首先，中国各创新主体应注重图书馆及期刊网络数据库的建设，并加大对国外先进网络数据库的购买，积极通过期刊购买、馆际互借及国际捐赠等各渠道获取前沿文献；其次，加大自身的吸收能力建设，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文献承载技术知识具有基础性、导向性及非成熟性，因此中国应加大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加强各创新主体的互动以加快技术知识的传播及创新成果的转化。

《国际视野中的积极老龄化研究》

□刘文 焦佩



刘文，山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东省欧美同学会理事、威海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持、参与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次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翻译教材，主编、参编教材3部，专著4部。承担“东亚视角的积极老龄化”“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20多项。近年来，围绕人口老龄化、东北亚人口和经济、自贸区、“一带一路”等进行研究，取得较好社会评价。

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影响着经济增长、储蓄、消费与投资、劳动力市场、税收及代际间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保健和医疗、家庭构成、生活安排、住房与人口流动等。因而，对老龄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成果在分析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基础上，阐释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提出及其政策设计，旨在为积极老龄化研究及其在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推进提供一个概括和广泛的分析框架。

一、人口老龄化在全球的发展和扩散，是积极老龄化提出的现实依据

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老龄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向亚洲和美洲地区扩散，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老龄和超老龄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发达国家面临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问题和养老保障的财政负担，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增加了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增长，但也面临给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压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没有太多时间调整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后果，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是发生在比发

达国家更低的社会经济水平之上，“未富先老”使其老龄化面临更多问题。积极老龄化正是要从生理、心理、政策、社会环境多方面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普遍有效的途径。

二、老龄化在国际层面被融入更广泛的发展进程，并关注整个社会和各个年龄段的人们

积极老龄化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身体积极，到经济参与积极，再到全面社会参与积极的发展过程。强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是积极老龄化的最初形态，生产性老龄化将老龄人群从对个体身心健康关注转为对个体经济参与度的关注，积极老龄化将老龄人群的社会参与扩展到各个方面，并要求政府和社会为老年社会参与提供帮助和支持。目前，健康、参与、保障已经成为积极老龄化的三大维度，其下具体的测量指标也处于不断完善中，从学理层面进入政策设计层面，旨在通过具体的措施使不同的老年个体都能根据自身情况，更好地维持健康，更好地参与社会，更好地得到权利保障和照顾。

三、积极老龄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21世纪老龄化问题的新理论、政策和发展战略

联合国第二次老龄世界大会通过的《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确定了积极老龄化的国际行动框架。此后积极老龄化理念体现在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中，扶贫计划、人口统计、城市发展、就业保障、人权保护、居住规划、妇女问题、青少年问题等领域都将老龄化作为一个独立议题来加以研究讨论。2006年以来，对《马德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持续审查和评价，促进了积极老龄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国际劳工组织以促进老龄就业为目标，从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保障两个方面落实《马德里行动计划》，解决的正是积极老龄化中最为实际的问题。欧盟是最主动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地区组织，欧洲老龄化布局正逐渐机制化、平台化。

四、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合，推进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作为老龄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中面临共同问题。加强与国际组织的联合，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探索这一领域中的若干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及与东西方各国的比较；中国

老年人健康(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参与)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老龄社会的经济特征及发展趋势(老龄产业、老龄就业、老龄消费、储蓄与投资关系变动趋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工业化、老龄化、城镇化“三化”互动发展；老龄社会的代际关系和代际资源配置；老龄社会支持体系(老年护理体系、老年通讯设施等)，老龄社会制度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企业、个人和家庭等主体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制度安排)，老龄公共管理体系及相关政策设计(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等)，为中国积极老龄化相关的制度、政策与法规的设计、制定和运行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支撑，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成为兼具学术与实践价值的重大研究任务。

该成果以人口老龄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为逻辑起点，构建分析积极老龄化的总体研究框架，丰富了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区域和国别内容，为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社会保障、人口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研究导入新的内涵和视角。同时，亦为政府和企业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相关政策、发展养老产业、构建老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老龄就业问题等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论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协同推进》

□李福华 王颖 赵普光



李福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教育科技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院校研究会理事、青岛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项、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6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高等学校薪酬管理研究》等多部。

近年来，治理理论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人们普遍认识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大学治理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学者们就如何优化大学治理结构，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提高大学治理能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在研究中，人们对于大学治理特别是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关系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甚至提出要用大学治理代替大学管理。

该成果认为，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但两者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需要协同推进。

一、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作用不同，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大学治理是在大学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协调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大学管理则是大学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其可调动的组织资源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进行优化配置，以有效实现学校目标的

创造性活动。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在目标、导向、主体、客体、实施基础、沟通方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

在不同层级的组织以及在同一组织的不同层次中，治理与管理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不同层级的组织中，组织的层级越高，越需要统筹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治理的职能越重要；而组织的层级越低，越强调任务的完成与目标的实现，管理的职能越重要。在同一个组织内部，组织上层的治理职能越重要，组织下层的治理作用越重要。按照上述逻辑，大学作为一级基层组织，既需要重视治理，更需要重视管理；在大学这一级组织内部，学校层次要相对重视治理，院系层次更需要重视管理。

二、我国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重点领域与研究主题

根据我国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该成果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重点领域与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分析。

(一)大学治理的重点领域与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完善大学治理结构，优化大学治理机制。包括培育新的大学治理主体，建立和完善网络化的参与机制，科学界定政府

与大学的权力边界，明确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和定位以及如何实现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平衡等。(2)建立与完善治理视野中的高校社会问责制。建立基于治理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主动的高校问责制度，有效规范学校的各种行为，促进学校持续改进与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益，应该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大学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大学管理的重点领域与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创新。我国在大学管理理念上，应当重点研究如何才能遵循“培育人才、知识创新”的使命追求和“以生为本、以师为尊”的治校逻辑。在大学管理模式上，要重点研究整体综合的顶层设计和管理模式安排，防止急功近利以及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管理。(2)质量管理与人才培养质量。要重点研究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教学评估制度、教学督导制度与学生评教制度的完善；各类质量标准的制定、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以及实施教育质量工程和质量控制等。(3)绩效评价体系建设与教师绩效管理。要研究如何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减少评价中行政权力的过多介入，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价值引导作用等。(4)管理者队伍专业化建设与能力建设。

重点研究以校长为首的大学管理者的任职条件、职业素养、遴选机制、流动机制、薪酬标准、考核机制及管理者的权力、动力、能力建设与去行政化问题等等。(5)加强基础建设、基本教学规范和基本管理规范建设、教研建设与课程建设研究、教师工作质量标准研究、基础信息收集与基础数据库建设、基本规章制度建设以及大学文化建设等。

三、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协同推进的主要路径

大学治理提供了大学运行的框架和基础，而大学管理则是在这个框架与基础下负责具体的目标实施，同时大学管理又会对大学治理起到调节作用，必须使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合理分工、密切合作，学校才能实现良性运转。因此，需要对大学治理和大学管理进行整合、协同推进。该成果认为，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协同推进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大学、政府、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协同推进。(2)实施战略管理，实现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协同推进。(3)制定与完善大学章程，实现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协同推进。(4)提高人员素质，实现大学治理与大学管理的协同推进。